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Library of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持久和平的 经济基础

**The Economic Basis
of a Durable Peace**



詹姆斯·E. 米德 (James E. Meade)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Library of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持久和平的 经济基础

**The Economic Basis
of a Durable Peace**



詹姆斯·E.米德 (James E. Meade) 著

高歌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持久和平的经济基础/ (英) 詹姆斯·E. 米德著; 高歌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ISBN 978-7-300-23576-6

I. ①持… II. ①詹… ②高…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3567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持久和平的经济基础

詹姆斯·E. 米德 著

高歌 译

Chijiu Heping de Jingji Jic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8.75 插页 1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0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初版于 1940 年，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国际经济秩序应当建立的基础原则。本书对在分裂的国家经济体系——无论自由的还是计划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之上构建这种国际秩序的可能性给予了特别关注。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作者将理论分析与对战争前夕经济形势的描述相结合，以经济学家和非专业读者都同样易于理解的语言风格进行写作。

目 录

第一章	序 篇	1
第二章	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	9
第三章	国际货币	21
第四章	浮动外汇汇率	36
第五章	国际贸易	47
第六章	国际资本流动	66
第七章	外汇管制和清偿协议	75
第八章	国际人口流动	95
第九章	殖民地和原材料供给	109
第十章	总结与结论	124

第一章 序 篇

本书的主旨在于讨论新国际秩序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在目前情况下，当眼下冲突的问题可以被预见之前，详细讨论和平解决的经济条款是不现实的。因为仍然无法知晓，当解决问题的时刻来临时，政治环境会是什么样的；哪些国家将参与解决；战争的经济损耗还会以何种程度持续多长时间。然而，尽管有诸多未知因素，确定的一般性原则依然存在，有必要进行讨论。

讨论和平解决的政治条款不属于本书的目的，但是，为了使相关经济问题的有益讨论成为可能，必须做出正确的假设。缺少某些形式的国际组织，经济事务的国际管制就无法实现；如后面章节中的论证所示，国际组织的经济基础的稳固性是值得怀疑的，除非组成的成员国

在经济领域限制各自国家的行动自由，将相应的经济决策权让与国际组织的适当部门。这些权力将与国际货币关系，以及商品贸易、资本和人口的国际流动息息相关。

因此，出于本书目的，设想和平解决的国际组织是存在的——无论这个组织是采取当前的还是修订后的国际联盟的形式，或者，比如，先前独立国家的联邦形式；并且进一步假设，成员国联合起来形成国际组织，根据该国际组织条款合理组建国际权威，负责某些经济问题的决策与管理。

国际组织的适用范围未必是全球性的，因此讨论经济关系时，问题不仅浮现于成员国之间，也浮现于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不过，假设国际组织成立初期就拥有宽泛的成员资格，或者另外经过特殊设计，成员资格可以在未来充分扩展。鉴于此，有必要在经济结构和政策具有广泛分歧的成员之间讨论经济关系。事实上，如何在差别迥异的经济体系之间建立公正有效的经济关系组织，正是后续章节的主要论题之一。

或许，为防止成员国之间或者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主要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可是，在国际组织的组建中会产生重要的经济考虑。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冲突的肇因本质上均具有经济特征；因此，一个国际组织只有立于稳定、公正和有效

的经济基础之上，才有望顺利完成首要的政治任务。然而，其次，国际组织无疑具有重要的从属目标——从各方面增进人类的福祉，帮助人们的思想和身体免于无知、贫困、疾病与仇恨。为实现提升生活水平的目标，必须对国际组织的经济权力和政策进行明智的决断。

至少在现代环境下，经济动机作为战争的起因被过分夸大了。因为只有当认为战争的发轫是由于期望得自军事征服的或有经济利益超出了开展战事的或有经济成本时，战争的纯粹经济理由才能够成立。在现代条件下，任何量级的战争成本都是如此沉重，以致无论如何，它能否在经济上实际上被偿还都值得怀疑。这并不意味着，从一场成本为零的战争或者没有流血的外交胜利中，无法获取经济利益。

在这里，可能仅阐述几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方式就足矣。通过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可以圈定一块特定的领地，作为抵御特定国家的市场；如果这些贸易限制对该国有歧视，而惠及它最相近的竞争者，该国的经济损失将会异常惨重。征服这块领地和取消这些贸易限制将会扩大该特定国家的出口市场。同理，针对重要出口商品的限制——尤其是如果带有歧视特征的限制——会对那些无论如何必须进口该国这些商品供给的国家造成损失。这些限制不仅采取直接出口关税的形式，还有垄断

性限制计划，其设计旨在对重要商品减少供给和提高价格；通过这种方式，出口国或殖民地的生产者能够以进口国的消费者为代价获得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该领地会使进口国清除自身经济福利发展的实际障碍。

同理，这种考虑可以用于国际资本流动或国际劳动力迁移中所实行的限制。对特殊领地的政治控制或影响会使某国出于自身利益获取某种资本发展的特权。其他国家为了分享该领地作为资本投资盈利领域的可能性，会希望争夺这种政治影响力。抑或，再如，基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资本设备，若某国已经背负相对沉重的人口负担，可能还只会在该国领土范围内面临因人口增长产生的就业困难。如果其他国家对该国移民紧闭大门，该国国会通过对可能的移民领域进行政治控制而发掘经济利益。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通过破坏阻碍出口或进口贸易的限制，或者破坏对资本流动和劳动力可能移民领域的限制——特殊国家会执意从战争的胜利中攫取经济利益，如果战争本身并非耗资不菲。并且，不仅可以通过撤销曾经在战胜国实施的贸易、资本或劳动力的限制而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在新占领的领地中设置对战胜者有利、对战败者不利的这些限制。在有些情况下，鉴于此，直接经济动机至少可以成为战争肇因的助燃剂。

在日本，经济就是重要因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增长的人口发现通往其出口市场和可能移民之处的途径被严格限制；同时，国家沉重的人口压力需要大量进口各种必需品。可是在其他情况下，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出于可能会对国家生活水平造成轻微但无疑决定性改变的目的，和平时期已经产生了巨额军费支出，战争时期亦已面临大规模的经济混乱和破坏。

但是这也无法证明经济因素没有在维持和平的失败中间接扮演真正重要的作用。经济事件会产生普遍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事实上，消除特殊贸易优惠的经济不公正不过对个体的生活水平造成细微的经济差异，却会导致国民的普遍愤恨。贫困——尤其是当国家经济瓦解时期，从舒适跌至贫困的衰落——会滋生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此时军事冒险比在其他任何时刻都更具诱惑力。同理，各种经济不确定性，尤其是失业，也许会导致沉郁的愤恨寻找发泄——出于纯粹的非理性原因——去反对国家的公敌。国家内部不同阶层或者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会产生类似的心理效应。

例如，两个至关重要的德国经济事件——即 1923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在引发持久和平的崩溃中扮演了虽然间接却实质性的角色。通货膨胀使德国的中产阶级坠入贫穷，至少在那部分人群中

催生了非正义的经济灾难感。1929 年后的萧条造成的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普遍失业和贫困大大深化了这种感觉。这两次事件形成的经济状况使德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得以重建。

大萧条的恶劣影响和大萧条本身一样波及世界。或轻或重，几乎每个国家都遭遇了就业和收入的骤然下滑，尽管大致归因于自然的技术经济因素，对此绝大多数人却茫然无知；这激起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对国际组织的合理发展最为排斥，恰逢此时，数年来风平浪静的稳定可能决定性地强化了 1918 年后创立的和平体系。

不仅如此，大萧条对国际关系具有更直接的影响。一般而言，当任何国家遭遇衰退时，可能会采取两种类型的政策，以克服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总体滑坡。首先，可以征收保护性关税和使用进口配额，发放隐蔽或公开性质的出口补贴，削减出口商品的行业工资成本，以及为降低本国商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而设计的本国货币非正当贬值，通过采取上述种种措施以其他国家为代价扩张特定国家的市场。为应对 1929 年后的萧条，这些措施被广为采用。它们不仅大抵无效——多数情况下，它们使得市场受到威胁的部分国家采用了平衡性报复性措施——而且自然导致了国际政治关系的急剧恶化。

第二种应对普遍衰退的主要方法是每个国家通过恢

复货币收入的货币和经济政策设计，主要依靠自身内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行再扩张。为此，可以采用多种措施。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引导生产者借入新基金用于支付资本发展。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可以通过借入新基金支付各种公共建设计划来支持这种“低息贷款”政策。这些用于资本建设的新货币支出流将会提升产业建设中的就业、工资和利润。相应的，这将导致增加的部分收入中对当前消费所需各种商品的支出。在生产消费品的产业中，就业、工资和利润将会上升。这将反过来导致消费品支出的进一步增加；随后的利润恢复将再度刺激私人资本建设。^①这种政策有助于增加国家的需求，不论将其实践于国内生产的商品还是国外进口的商品，都不无裨益；这样一来，它明确缓解了其他国家寻求市场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普遍大萧条最常见的特征。确实，这可能会导致单独采取这种国内“通货再膨胀”政策的特定国家产生过度失衡的进口，这种危险会不得不需要特别的保护性措施；但是如果多数国家同时采用了内部扩张政策，每个国家将会发觉，它

^① 对各种过程更加详细的解释参阅 J. E. 米德《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第一部分，对于当前消费支出的直接刺激计划的建议可以参阅 J. E. 米德《消费者信贷和失业》(Consumers' Credits and Unemployment)。

的外部市场正和自身的进口需求一样迅速扩张。因此，可以稳稳地得出结论——面对贸易萧条时采用正确的政策原则，这是持久和平的首要经济基础之一。^①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经济因素可以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国际冲突的发轫。为了将其潜能降至最低，建立公正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则值得期待。然而这样的经济秩序，或许首先于己或为己应令人满意，因为它是提升生活水平的工具。本书后续章节的撰写思路大致以后者为主题；只是正如之前的评述所阐明的，在良好国际关系的发展中，繁荣与和平应当相互支撑。

^① 除了上文提及的引发战争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因素外，还有另一层面的半经济和半军事因素。国家为了使自身在战争时期更接近自给自足，需要寻求对必需品供给资源的控制；对这类商品控制的搜寻会为冲突提供半军事和半经济的理由。

第二章 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

近年来，随着各国的经济结构日趋多样化，确立公正有效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基础原则问题显得极为复杂。19 世纪晚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之前的 20 世纪早期，大多数国家将经济体系建立于同样的基本模式之上。产权归私人所有，生产由私人管理，容许竞争经济市场的力量决定价格、产出、就业和工资。政府干预和管制仅在有限的程度和有些领域——比如社会福利的公共监管——迅速增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制也保持为一种例外，是对自由市场状态和个人主义竞争中一般原则的修正。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在共同的货币金本位制基础上进行交易。例如，在像英国这样举足轻重的国家里，通过采用自由贸易的商业政策，将

经济自由放任的原则应用于国际贸易；其他许多国家关税相对较低；近期像进口配额、外汇控制、清算协议和其他类似用于严格外贸管制的全部工具，则只在上述措施缺席时才得以彰显。并且相比前几年，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劳动力移民的限制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定成立国际组织，按照常理，经济基础自然会隶属那些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组织自身可能会合理地建立于统一货币以及贸易、资本和劳动力在各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之上，每个成员国自身会采取经济自由放任的基本国策。

不过，这几年的情况却大相径庭。重要国家依旧持续将最近和平时期的经济基于自由的个人主义原则。可是即使在这些情形里，政府管制的上层建筑也迅猛增长，凌驾于竞争性的经济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在这些主要的自由经济中，经济和货币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同期，以政府控制与管理作为基础经济原则的经济体系业已呈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苏联，这里产权收归国有，企业由政府管理，价格和产出接受中央计划，对外贸易形成国家垄断。在“自由”和“计划”经济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事实上，出于各种类别、各种目的和各种严格程度，经济自由与国家控制的组合会存在几乎无限多种的可能性。并且，真正的“计划”经济在各

自计划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为之选取的政府管制方法上亦是大相径庭。

现有经济结构和政策的多样性对本书的讨论很有意义，对阐明近期发展的主要分歧非常重要。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可以作为重要国家的实例，三者在和平时期的经济都保持了基本的自由。整体而言，生产和贸易已经受私人企业支配，工业资本和农用土地还保持私人所有权。大体上，价格、利润、工资和产出已经交给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三者和其他国家涉及外汇兑换的交易则无拘无束。对外贸易服从各种限制；但是，法国是一个例外，限制主要采取进口关税的形式，仅在小范围通过进口配额的手段采用更加严格和苛刻的数量控制形式。

当这种基本结构在自由经济中普遍保留时，也有很多国家干预和部分特殊产业实行“计划”的例子。近年来在特殊国家，工资和工时的控制，农业价格和生产的控制，以及总之，保护性目的的外贸控制均与日俱增。在英国和法国，战争控制已经用于利润、价格、生产和就业；无法预料，作为永久的和平措施，这些控制能在何种程度保持为温和的形式。

在所有的“自由”经济中，为减轻大萧条引起的严重失业问题，1929—1939年间，政府已经尝试了各种金融和经济干预的试验。关于这些各种“反衰退”措施，

自由经济的经济政策表现出了它们最显著的分歧；恰如在后两章里将要看到的，对于有效国际组织的形成而言，这种分歧产生了最重要的问题。^①

1931年，迫于大萧条的压力，作为既有账户平衡压力和相应黄金沉重损失的结果，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外汇贬值。同时，引入一般税则，从国外竞争中保护英国市场；1932年，《渥太华协定》在该关税结构中引入帝国特惠制。货币扩张的国内政策被采纳，自1932年以来，它就非常成功地为生产者提供低价充足的货币供给。但是同时国家并不沉湎于任何促进恢复的公共工程的支出项目；事实上，直到1937年大规模发展重振项目，1931年后的预算都严格保持平衡。保护与低价货币的组合带来生机勃勃的经济复原。

英国并未着手任何国内经济计划或控制的广泛策划，只有农业例外，各种营销策划——通常基于对本国市场的保护——设计出台用于控制农业价格和产出，扩大国内产量。然而，法国和美国却尝试了更为非传统的试验。在法国，起初是通过严格遵守金本位制以及价格、收入

^① 考虑到下文对1929年后英国、法国和美国采取的各种“反衰退”政策的简短描述，读者应牢记上一章中提及的政策——设计意图旨在以其他国家市场为代价来扩张本国市场的政策，以及同时顺带助益于他国商品市场扩张的国内扩张政策——之间的区别。